

THE
GENERAL ANNAL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CADEMICS II

20世纪
儒学通志

庞朴 主编

学案卷
(下)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HE
GENERAL ANNAL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CADEMICS II

20世纪
儒学通志

庞朴 主编

学案卷
(下)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儒学通志 / 庞朴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308-10927-7

I. ①2… II. ①庞…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
20世纪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8203 号

20世纪儒学通志

庞朴 主编

出品人 傅 强

总编辑 徐有智

组稿策划 黄宝忠

特约编辑 斯章梅

责任编辑 葛玉丹 陈佩钰 黄宝忠 胡 宁

封面设计 彭若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1.5

字 数 2500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927-7

定 价 4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陈荣捷儒学学案 ······	(1)
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 ······	(3)
李镜池儒学学案 ······	(29)
《周易》筮辞考(节选) ······	(31)
金景芳儒学学案 ······	(53)
《易》论(节选) ······	(55)
贺麟儒学学案 ······	(84)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	(86)
徐复观儒学学案 ······	(98)
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节选) ······	(100)
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 ······	(124)
侯外庐儒学学案 ······	(135)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自序 ······	(137)
中国思想通史(节选) ······	(139)
赵纪彬儒学学案 ······	(163)
论语新探 ·绪论 ······	(165)

论语新探(节选).....	(170)
高赞非儒学学案	(191)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	(193)
匡亚明儒学学案	(208)
孔子评传(节选).....	(210)
杨荣国儒学学案	(227)
中国古代思想史·序言.....	(229)
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232)
唐君毅儒学学案	(240)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导论.....	(242)
张岱年儒学学案	(271)
孔子哲学解析.....	(273)
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	(286)
牟宗三儒学学案	(300)
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302)
心体与性体·序.....	(324)
心体与性体(节选).....	(326)
任继愈儒学学案	(356)
儒家与儒教.....	(358)
关锋儒学学案	(368)
论孔子(节选).....	(370)
关于孔子思想讨论中的阶级分析的几个问题.....	(399)

目 录

庞朴儒学学案	(422)
儒家辩证法研究(节选)	(424)
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	(449)
余英时儒学学案	(457)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459)
钱穆与新儒家(节选)	(470)
李泽厚儒学学案	(488)
孔子再评价	(490)
蔡仁厚儒学学案	(523)
新儒家的精神方向	(525)
宋明理学·北宋篇·绪论	(536)
刘述先儒学学案	(548)
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	(550)
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561)
杜维明儒学学案	(575)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577)
参考文献	(606)
名词索引	(622)
人名索引	(634)

陈荣捷儒学学案

陈荣捷(1901—1994)，广东开平人。现代哲学史家、朱子学专家，美籍华裔学者。

陈荣捷幼入私塾，习读“四书五经”。1916年春，考入香港拔萃书院，同年秋考入广州岭南学堂。1917年，进入岭南中学，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广州学生联合会部长。1924年，于岭南学院(后改名为岭南大学)毕业，赴美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英语系、哲学系学习。192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岭南大学教务长。1932—1934年，兼任中山大学教授。1935年秋，赴夏威夷大学任教。1939年，与哲学界知名人士发起创设“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40年，兼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1942年，任新罕布尔什州达特默尔学院比较文学系访问教授。1951年，任达特默尔学院人文学院院长。1978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0年，被选为美国“亚洲及比较哲学学会”会长。1986年，任北美华裔学人协会副会长。1994年8月12日病逝。

陈荣捷是20世纪后半期国际汉学界公认的新儒学与朱熹研究的权威，在中国哲学尤其是新儒学研究及向西方世界传播儒学方面均有重要贡献。40—50年代，其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哲学等的总体性论述方面，在此期间有英文著作《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中国哲学历史图表》、《中国哲学大纲及附注参考书目》等。60年代，为《大英百科全书》等撰写有关中国哲学包括儒家等思想家的文章和条目，一时被欧美学术界誉为把中国哲学最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大儒。60年代以

后,其学术研究逐渐转向新儒学领域,并越来越专注于朱熹的研究。1963年,出版英文译著《王阳明的传习录及其他著述》。1967年,出版英译《近思录》。1982年,出版了两部朱熹研究的中文著作——《朱子门人》和《朱学论集》。1988年,出版《朱子新探索》一书,所论多为学者历来所不及论者,涉及朱熹生平、思想、事迹及其有关的历史人物,发掘了大量以往不被注意的新材料,大大细化和深化了朱熹研究。1990年,出版《朱熹》。1992年,出版《近思录详注集评》。除此之外,陈荣捷还有英文朱子学论著《〈近思录〉——新儒学文选》、《新儒学词释:〈北溪字义〉》、《朱熹的生活和思想》、《朱子新研究》等。

(法 帅)

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①

陈荣捷先生原著：*CHU HSI'S COMPLETION OF NEO-CONFUCIANISM*，为法国巴黎大学华学大师E. Balazs纪念论文集而作，载于《宋学》(SUNG STUDIES)一志中。陈先生著作等身。现任美国Chatham College退休荣誉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哈佛、加州、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宣扬中国思想并翻译儒佛经籍，在当代实无出其右。《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俱有英译本。其论著散见国内外杂志。承陈先生邮赠本译文英文原著，谨译出藉酬奖掖后学之盛情。道远难以请益，当自负谬误之责。附注中有仅引书名卷页数而未引出原文者极多，兹特引录原文原句。此虽使篇幅增繁，然一以便省读者之翻阅，二以使读者得进窥陈先生于新儒学寝馈之深与治学方法之密。自信费时固多，功不唐捐。又陈先生文中亦有摘译诸儒原文，而未加引号者，译者特于诸儒文集中察出原文，仍保持原句为译文。此不仅意在存真，且使读者多能远契先儒论学论道之本来面目与精神耳。

——译 者

治中国思想者，咸知朱熹为将新儒学导致最高发展最伟大之新儒家，但其贡献之在哲学上重要性，则殊少论及。^②《宋史》引述朱熹高足黄榦（1152—1221）语，“道之正统，由孔……孟而后，周、程、张子继其

① 本文由万先法译。

② 钱穆在《思想与时代》1947年9月号第13—17页，曾略述其贡献。

绝，至先生而始著”^①。但《宋史》于朱子之如何有功于儒学亦未予阐述。黄榦于其《朱子行状》中谓其师于周、程、张、邵四先生之书，为之裒集发明，但勉斋亦未有所阐发。^② 自来学者固多觉察朱子之重要贡献，但若非概括之论述，徒谓朱子集新儒学之大成，即仅简述朱子学术之一二点，几无一能外乎此者。吾人应特别认识朱子于儒学之基本改变以及其改变之哲学上的重要性。

“集大成”一词乃孟子用以赞述孔子，犹之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推孟子之意，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③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乃圣之时者也。^④ 依朱子之释，三子为一小成，而孔子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⑤ 当其训释孔子之际，朱子或未遑以大成自居，但若就新儒学而论，朱子之所成就者，亦正如孔子集前圣之成就。

朱子之集大成，约有三端，即新儒家哲学之发展与完成，新儒学传受道统之建立，以及《论》、《孟》、《学》、《庸》之集合为四子书。凡此俱关涉儒家哲学、儒家传统以及儒家资料与方法。而此一集大成，姑无论仅为一种综合，一种重建，或为一种创造，俱属仁智互见。^⑥ 朱子固未运用任何儒学新资料或创造任何新名词，但朱子所予新儒学之新特质与新面貌，此实无可否定。其支配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思想者，达数百年之久。自未能视为一历史上偶然事件也。

一 新儒家哲学之完成

朱子于新儒家哲学之完成，诚有多端。兹从四方面论述之：

① 《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第19—20页。

② 《勉斋集》卷三十六，第43页。

③ 据传统所述，伯夷忠于商。商为周灭，耻食周粟以至饿死。伊尹事汤建国。柳下惠在孔子以前，曾为鲁吏，以诚实与清廉著称。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十三章。

④ 《孟子·万章第五下》，第一章。

⑤ 《孟子集注·万章下》，见“孔子之谓集大成”句下朱注。

⑥ 如周予同《朱熹》(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1页有云：“朱熹之本体论，实混合周程之说而又与周程各异，朱熹之所以集宋学大成者在此，而朱熹之所以无创见者亦在此。”以及常盘大定：《支那に于ける佛と教儒教道教》，东京东洋文库1930年版，第336页。两人俱不以朱熹为开创者。

(一) 确定新儒家之方向

新儒家在第 11 世纪之兴起,固由于儒学攻击汉代经典版本注疏之学以及唐代文学之研求。而佛学发展之挑战与夫宋代建国以来,社会与政治改革之迫切,其势俱需要在观念研讨上,有所转移。因之,经籍中之《春秋》与《易经》在当时蔚为钻研兴趣之热潮。所谓宋学三先生胡瑗(993—1059)、孙复(992—1027)与石介(1005—1045),均孜孜于《春秋》。胡瑗、司马光(1014—1085)、王安石(1021—1086)辈则致力于《易经》讲授与撰注。前者探讨政府治平之原理,后者示人以待人接物之方与实务。就儒学历史言,此一运动之创新,实由于在各方面均已远离汉唐儒家之学风。因而成为新儒学。但其学术兴趣,基本上仍是传统,亦即仍在个人修养、社会秩序与世界和平。如实言之,学者如司马光、王安石终乃经世之士。但至 11 世纪末,新儒学有较高之发展,使儒学进入一新境域。所谓北宋五先生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与邵雍,固不仅有志于经世之务,抑且更进而寻求了解事物之理与性。整个运动由此而推动而发展,名之为性理之学。

但若以五先生所趋之方向全同,或共同凑集于理之观念,是亦不然。周敦颐以所著《通书》及《太极图说》见称。前者之基本观念为诚,后者所强调者为静,^①《图说》简言之谓“无极而太极”。又谓“太极动而生阳……阴,两气交感,而化生万物,惟人得其秀而最灵”。又谓圣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而主静为本”。周子得太极图于道家穆伯长,伯长传自陈抟(906—989)。《太极图说》虽在探讨上是唯理,而其含有道家气味则显而易见。理字固见于《通书》^②,但在书中并非重要。

理字常见于张载与邵雍著述之中。但此亦不过《易经》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③学说之重述,尚非一种哲学系统之主旨。

在张载,存在之基本要素为气。张子认气与太极为一,阴阳为其两面。就体言,当其发散而未凝聚,气为太虚。就用言,当其动静,其聚散,气为太和。在其持久凝聚与发散之过程中,有若干基本法则之运行。如

^① 参见陈译:《中国哲学资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部 1963 年版,第 463—465 页。(以后所引,简称陈译《中哲资料》。)

^② 《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 474 页。

^③ 《易经·说卦》,第一章。

谓物必有对，无物可以孤立。抑且，依理言，物有始终，有聚散。因之，理自有其重要之地位，但根本要素仍为气。^① 在邵雍，存在之基本要素为数。良以宇宙之运行或变动由于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而数生于理。^② 理虽重要，但仍属背景。能使理之观念为其哲学体系之基石者，唯两程子为然。事实上，使理之观念居于中国哲学史最关键之地位，以两程子为先河。理之观念初不为早期儒家所重，亦每为汉唐时代所忽视。但在佛教之冲击下，尤在华严宗事理圆融观之哲学，发展至顶峰情况之下，早期新儒家亦唯有亦步亦趋，寻摘上述《易经》语，以为支援。二程兄弟不仅有如其他新儒学所为，只仅发挥上述《易经》语之观念，而继而使此理之观念，为其整个哲学之中心。^③ 依二程言，理同于人之性，物之性。程颐云，“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④，一物须有一理”。程颢亦云，“有物有则，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⑤。

吾人可知 11 世纪末，新儒学中，约言之，有四种趋势，一为虽唯理而带有道家气息，一为集中于气，一为数，一为理。苟朱子所偏好于张邵之哲学，或周敦颐道家之倾向，则新儒学在近七百五十年来之往程，必将全异其涂辙。但朱子采择二程兄弟唯理哲学，尤以程颐思想为甚。驯致其结果，整个新儒学运动，至今称之为理学或程朱学派。

在朱子抉择中，使新儒学免沦为道家之厄。吾人前已指陈周敦颐思想著述中之道家成分，当时对于《易经》之广泛兴趣，诚易使新儒家为道家哲学所吸引。《易经》一书在前数世纪，固大半用为道家之占卜也。新儒家一(理或气)生二(阴阳)，与二生万物之基本宇宙论，有如《太极图说》所显示，亦可于老子书中寻其端绪。^⑥ 佛学无论在理之观念上与心性之学上，俱有莫大之影响。新儒家固极反佛与反道^⑦，但佛道两家

^① 《正蒙·太和篇第一》。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 500—507 页。

^② 《皇极经世书》卷七下，第 19 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 490 页。

^③ 参见英文陈著《新儒学理之思想演进》一文，载《清华学报》新 4 卷第 2 期(1964 年)，第 123—149 页。并见万先法译文，《人生》第 31 卷第 6 期(1966 年 10 月)，第 18—25 页；第 7 期(1966 年 11 月)，第 12—20 页。

^④ 《诗经》第 260 篇，《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⑤ 《遗书》卷十八，第 9 页，及卷十一，第 5 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 62 节，第 540 页，及第 48 节，第 563 页。

^⑥ 《老子》第四十二章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⑦ 见陈译《中哲资料》，第 543—546、695、700、714—715 页。

学说凌驾儒学之危机曾如是之大而真实。

如何扬抑于佛老之学，朱子之地位实居关键，而朱子抑之。其于周敦颐，吾人可知朱子费尽心力，在其注周子《太极图说》中，以儒家思想解释道家极显明之无极观念。因而将周敦颐道家思想洗涤荡尽。其于邵子则简直弃之而不顾。其最佳例证莫于其摒弃邵雍于其所辑《近思录》之外。在淳熙二年(1175)，朱子与吕祖谦两人，于周敦颐、二程兄弟与张载四儒著述之中，选辑六百二十二条，以代表新儒家之全部教义。此一部《近思录》，实是第一部新儒学之专集，并作为以后《性理大全》一书之范本。此部《性理大全》，自永乐十三年(1415)以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来用作国家考试取士之资。其影响并笼络中国思想者达五百年之久。此辑录并为自朱子以至19世纪以来，儒家之无数辑录之鼓舞与垂范。^①

邵雍完全摈弃于《近思录》之外。并未自其集中直接征引一节，仅程颢引述其语一次而已。^② 邵雍之所以全然摒弃，乃由于邵子于孔门谈论仁义之基本教义，几至未予论述。但尤为重要者为邵子哲学在本质上道家气味过重。邵雍象数之学得自于道家李之才，^③而李则由陈抟所传授。^④ 朱子避而不录邵子者，乃使新儒学远离于道家之轨道。

朱子之远离道家之嫌，即在细节上亦然。此于《近思录》中朱子曾更改一段，可作明证。在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原作中，原句有谓“故曰性其情”，又谓“故曰情其性”。朱子将此两句俱予删除。良以前一句来自王弼(226—249)之注《易》^⑤，在其《易》注中正反映汉儒性善而情

^① 此类《近思录》后继解题，详见陈译《近思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序言，第35页，附注113。

^② 《近思录》卷五，第十五条，有“尧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段。并见陈译《近思录》，第162页，附注34。

^③ 《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

^④ 《宋史》卷四三一，《李之才传》。“时苏舜钦辈亦从(穆)修学易，其未接受者惟之才乎。修之易，受之秋放，放受之陈抟。源流最远，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

^⑤ 《乾卦》，王弼注。“利贞者性情也。”又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恶之共同信念，而此一信念最受道家之影响。^①

至若张载，朱子虽予盛赞，但其以气为终极实体之基本哲学，殊不为朱子所愿接受。依朱子意，气一于性，但必须依附于理。朱子谓横渠之于二程，犹伊尹伯夷之于孔子，^②伊尹事太甲，伯夷宁饥死而不事武王。孟子虽谓伯夷伊尹之于孔子，其圣一也，但伯夷之成德，为“非其君不事”，伊尹之成德，为“何事非君”。惟吾孔子，“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③。易言之，张子气之哲学，得其一偏，而二程理之哲学，则圆融焉。

朱子之宗二程，其为一哲学性选择之结果，至为显然。姑不论自觉或非自觉，朱子乃引导新儒学，出于唯物论（如张载）或道家之自然主义（如周敦颐与邵雍）之樊笼，而环绕学理之路线迈进。

(二)理与气关系之厘清

吾人经已说明二程兄弟以理作为其哲学之骨干。朱熹以前，二程已将理之观念发展至最高峰。依二程意，理为自明，为自足，为无所不在，并且主宰万物。理不增不损。万理归于一理，盖定理亦理而已。理即心、真实、宇宙秩序、自然法则与宇宙创造之理。理与人物之性为一。同时又是善之长。^④ 但二程兄弟于理气关系并无清晰之阐述。于此方向，其名句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⑤。程

^① 《近思录》卷二，第三条。载《伊川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此文亦见《伊川文集》卷四，第1—2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546—551页，全译文。

^② 《语类》卷九十三，第八十七“横渠”条，第3751页（第13页）。译者按：朱子此意，不仅《语类》上有是说，在“语孟集义序”中亦谓“若张公之于先生，论其所至，窃意其犹伯夷伊尹之于孔子”。《朱子文集》卷七十五，第20页。

^③ 《孟子·万章第五下》，第一章。

^④ 《遗书》，“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卷一，第2页）。“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卷二上，第19页）。“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卷十一，第5页）。“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卷十一，第11页）。“物则事也，凡事上穷极其理，则无不通”（卷十五，第1页）。“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一草一木皆是理”（卷十八，第8—9页）。“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卷十八，第17页）。“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卷十九，第1页）。“性即理也”（卷二十二上，第11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三十一章，第3、23、62、70各节。第三十二章，第17、47—48、58、62、66各节），以及《伊川易传》，“天下之理一也……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卷三，第3页）。“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天地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卷三，第6页）。“在物为理”（卷四，第20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三十二章，第75—77节）。

^⑤ 《遗书》卷六，第2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536页，第36节，及第552页，第12节。

颢谓“气外无神，神外无气”。程颐亦谓“离了阴阳更无道”^①。程颐并将其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予以细分。^②吾人似可说程颢重在理气之合，而程颐则重在理气之殊。但为此区分二程，则未免过于简单。盖适所引程子之名句，乃兄弟两人之语也。其主要关键，则在二程兄弟于理气关系之阐述，终嫌笼统。理与气两者间究相同乎？抑相异乎？孰为主从？孰为先后？朱子及其门人于此问题则反复辩难，讨论极多。^③

亦如二程兄弟，朱子谓“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④。但又谓“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⑤。朱子将理与气予以坚强之判断。在朱子，理必须用以阐释事物之本质与普遍性。理为形而上，为一，为永恒与不变，为一致，为事物本质之构成，为不灭，为创造之因以及常为至善。在另一方面，气则必须用以阐释形而下，个别性，以及事物之变化。气为器，为多，为暂时与多变，为众殊，为事物结构之构成，为可灭，为创造之具与资料以及具有善与恶。朱子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⑥。吾人或可说，在此理气之判断下，朱子在基本上宗程颐。但理气之景象，至朱子则益显明确。

二程子并不关心理气如何依存与孰为先后诸问题。关于前者，朱子之答复，为理气未尝相离。气未尝离乎理而独立，甚为显然，良以气依傍理而行。但理可否离乎气而独立？朱子之答复亦为否定。依朱子意，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理非仅为意度或抽象。有存在之理，因而理必存在，而存在则需气。朱子谓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亦惟有是气，则理方有安顿处。理与气固相离，但因互相依存，故亦相即。

^① 《遗书》卷十一，第4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540页，第58节。又卷十五，第14—15页。“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558页，第36节。

^② 《遗书》卷十五，第14—15页。“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558页，第36节。

^③ 《语类》卷九十四，第3755—3794页，专论周子之《太极图说》。可见篇幅之多。

^④ 《语类》卷一，第六“天下”条，第2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634页，第100节。

^⑤ 《朱子文集》卷四十六，《答刘叔书文书》，第24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637页，第110节。

^⑥ 《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第4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636页，第109节。

故就理于气之关系言，理不能仅谓为内在或超越，理实两者俱有。^①

至若理气孰先之问题，朱熹一再谓未有此事，先有此理。由于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气自较理为后。甚至在天地未判时，却有此理。但朱子又谓此理是超时间性。朱子谓吾人不能说今日有是理，明日有是气。朱子似力辩，依逻辑言，气须依理运行，故必先有此理，但实际上两者不能孰为先后。此或即朱子所谓此本无先后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但朱子自认此皆不可得而推究。^②

(三)太极观念之发展

理气之另一关系则涉及太极观念。于朱子以前，太极观念并不重要。二程兄弟从不提及太极。^③ 张载、邵雍亦少论及，有之亦偶然。吾人已知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但周子初本以《通书》见称。《太极图说》远与《通书》不类，因之有人怀疑周子未有《图说》之作。^④ 朱熹于周子著作中特表扬《图说》，并予重要地位，使之成为新儒学哲学之基石。自朱子以来，《太极图说》已为新儒家形而上学讨论之起点。《图说》已成新儒学之辑录如《近思录》、《性理大全》诸书之首章。《图说》由之亦引起论辩达数百年之久。诚然，《宋元学案》为减少争论，特将《通书》置于《太极图说》之前。^⑤ 但其争论在哲学性本身，并不比在太极图真伪及其解说之多。在争论期中，《太极图说》仍为新儒家哲学之基石。朱子之塑造新儒家哲学，仍以此《图说》为主要基础。朱子之所为，非仅只综合诸儒之不同概念。此非仅为一结构上之重组或综合，有如吾人所

^① 《语类》卷一，第十五“徐问”条十四“问有”条，第2—5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634—638页，第110—113节。译者按：卷一，论理气，朱子有谓“理未尝离乎气”。又谓“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又谓“气依傍这理行”。“此本无先后之可言。”故理亦内在，亦超越，皆蕴此义。

^② 《语类》卷一，第十五“徐问”条十四“问有”条，第2—5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634—638页，第110—113节。译者按：卷一，论理气，朱子有谓“理未尝离乎气”。又谓“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又谓“气依傍这理行”。“此本无先后之可言。”故理亦内在，亦超越，皆蕴此义。

^③ 《伊川易传·易序》中，固提及太极，如谓“易有太极……太极者道也”。但此序系伪作。

^④ 陆象山：《象山全集》卷二，《与朱元晦第一书》，第5页。

^⑤ 《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有云：“百家谨案：《通书》传道之书也，朱子释之详矣……《性理》首《太极图说》，兹首《通书》者，以《太极图说》，后儒有尊之者、亦有议之者，不若《通书》之纯粹无疵也。”

尝称者。朱子学说实为一有机之重建。此是朱子新儒学独造之论。若谓为朱子一家之言，则益为确切。

朱子之取资于太极，须经一番大奋斗。有如前所指陈，太极图渊源于道家。朱子之学虽与道家不契，但朱子亦必收敛其矜持而取资于太极图。此图亦含“无”之观念，而此一观念绝非儒家所能接受。不仅此也，朱子还须阐明二程兄弟为何于太极图全然缄默，此为吾人以后将提及者。朱子虽遭遇此类困难，仍须利用此一太极观念，实以一种具有逻辑性、综合性、有机性之新儒家哲学系统，不能无此观念也。

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为两橛，每易趋于两元论或导致孰为主从。于二程学说中尚未见显明。而于朱子，此种两橛渐较显著，因而两难之困局，亦至迫切。朱子为免于此一困局，乃转而求之于太极观念。有如朱子所释，极者至极也，因而太极为事事物物之极致。更明确言之，太极是理之极致。因之，朱子以太极即理。

极亦意指中。此中非为每一事物之形体之中，乃为其品性之适中，为其质地之无过与不及，为其体性之内在。所以太极实指谓每一事物之最高理则。

太极即理，更确定朱子导引新儒学步入理之路向。设朱子随顺张载或邵雍对太极之解说，朱子惟有归结于气或道家之自然主义。正因张载以太极，基本上为一气之流行。在张载太虚、太和为一体，其中便含阴阳二气。^① 邵雍虽谓太极是心，其卒也，太极是数。^② 周敦颐未视太极同于理。如实言之，周子于太极与理气间可能关系未作任何提示。唯有朱子始创明太极即理。此一创明，乃朱子本人以新儒学为理学之发展所必需。太极同于理之思想，正用以阐释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关系，或一与多之关系以及创造之过程。

依朱熹，太极乃一普遍之一理。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但此太极，非可视为静止形态。有如朱子所说，理无穷尽。有一物即有一理。太极亦非意谓有一定之尽头。毋宁意谓为无限潜力之储能。因之，新事物不仅可能，抑且为不可避免。太极是理，亦意谓非虚理而为

^① 《正蒙·太和篇第一》，参见陈译《中哲资料》，第505页，第12—13节。

^② 《皇极经世书》卷八下，第23、25页。